

FUNU YU FAZHAN

妇女与发展

——发展中国家妇女生活剖析

作为人类一半的妇女，许多人面临着失业、卖淫、廉价打工、家庭从属、生育、性奴隶等种种苦恼和忧思。提起她们的发展和解放这个话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妇女与发展

陈少君
李尧
刘馨颖 主编

青岛出版社

120
12

妇女与发展

——发展中国家妇女生活剖析

陈少君 李尧 刘馨颖 主编

青岛出版社

鲁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高继民
李茗茗
封面设计 关守信

妇女与发展

——发展中国家妇女生活剖析
陈少君 李尧 刘馨颖 主编

*

青岛出版社出版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邮政编码:26607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胶南市印刷厂印刷

*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32 开(850×1168 毫米) 7.125 印张 170 千字

ISBN 7-5436-1307-7/D · 98

定价:9.80 元

前　　言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将于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这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无疑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作为新中国妇女生活的直接体验者与参与者；作为曾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过，目睹了西方妇女的生活现状，并有意识地对西方妇女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一番认真探讨的中青年学者，我们深深地感到，目前国内关于妇女问题的研究还有不少空白的领域，许多国外妇女理论的动态、研究成果，及世界妇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生存现状还很少为国人所知。这种现实与我们的使命很不适应。为此，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们不揣浅陋，编写了《妇女与发展》一书，以此献给同处发展之中的同胞姐妹，献给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在《妇女与发展》一书中，我们试图通过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展示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生存现状；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国际垄断以及传统势力对广大劳动妇女的剥削和压迫。同时，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我们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对妇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种种影响。

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打开一扇窗户，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发展中的姐妹们——她们的痛苦、她们的忧思及她们的现实生活，这对于处于改革开放中的国人将会大有裨益。

本书的编写离不开国内外妇女理论家们的卓越贡献，在此我们深表谢忱。同时我们还要向日本JCI贸易株式会社驻京首席代表刘晓南先生表示我们深深的敬意与衷心的感谢，感谢两年多来，刘先生对我们编写工作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

编者 1995.3.8

目 录

第一章 西方妇女理论扫描	(1)
· 西方主要妇女理论浅析	(2)
第二章 妇女与发展	(23)
· 再论妇女与发展	(24)
· 从阶级与性别不平等看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31)
第三章 妇女与非洲	(42)
· 妇女与非洲国家	(43)
· 尼日利亚妇女的劳动与意识形态	(62)
· 妇女与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农业	(71)
第四章 全球工厂中的打工妹	(76)
· 全球生产线上的妇女们	(77)
· “出境工厂”与打工妹	(102)
第五章 廉价女工	(114)
· 为口红而工作？——摩洛哥服装业的女工们	(115)
· 墨西哥草莓农业中的廉价女工	(133)
· 秘鲁集市中的妇女们	(143)

第六章 妇女生育与健康	(157)
• 从南亚妇女的生育观谈起	(158)
• 巴基斯坦的人口问题	(163)
• 妇女与健康	(166)
第七章 妇女的地位——一个永远的话题	(183)
• 印度妇女在议会中的地位	(184)
• 妇女的从属地位和对妇女性行为的控制	(196)
• 基督传教士与第三世界妇女	(202)
• 远走他乡的女人们	(207)

第一章 西方妇女理论扫描

理论是客观现实的必然反映。西方各派妇女理论尽管有些偏颇与激进，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

西方主要妇女理论浅析

随着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一天天临近,有关妇女问题的各种论著日益增多,国人已开始越来越多地了解并关注世界妇女的种种问题、现状及发展。其实在西方,尤其是这几十年来,有关妇女问题的研究早已系统化、规模化,专门研究妇女问题的机构、社团及大学的研究中心,比比皆是。对世界妇女,特别是第三世界妇女的研究,更似雨后春笋,蔚然成风。为了使更多的人更好地了解西方众多妇女论著(述)的理论基础,我们将在这里分析和探讨“自由女权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论”、“激进女权论”、“社会主义女权论”、“有色妇女论”及“妇女参与发展学说”等主要的西方妇女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论(TRADITIONAL MARXISM)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类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只要求助于一定的技能就会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就会传宗接代。现实生活中,这些不同的生存技能往往需要有许多适当的社会组织来相适应。于是乎,在人与人之间便出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人们的各种行为——他们的动机、兴趣、能力,甚至他们的种种要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取决于他们所依赖的那个社会组织。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这便是他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必然反映。然而,就人类创造社会组织而言,人类不该被看作是完全被动的一类——受他们所处的环境摆布,而应被当作自己命运最终的创造者。

事实上,人类社会充满了矛盾。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当一个

社会处在多数人创造财富,而少数人拥有财富和权力的阶级社会中,大多数人不可能真正而平等地发挥其能力和潜力。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对利润无限度地追求决定了人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所受教育及家庭生活,甚至人际关系,也就因此大大地降低了人类的生存质量。

与自由派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妇女和男人遭受剥削和压迫的现实,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形,而是它固有的结构特征,即少数人剥削和压迫大多数人。其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要想扭转这一现状,只靠技术革命还不行,还要进行政治革命。自由派同马克思主义派之间有关妇女解放的分歧已有很长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自由女权主义斥责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并试图从社会组织的特殊制度——而不是从其他什么方面——来寻找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于是马克思主义者发现,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的产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阶级等级和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恩格斯,1884年)。紧随恩格斯之后的是埃莉诺·利考克(Eleanor Leacock)及其他女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她们的研究证明,在无阶级的社会中,性别角色与两性作用是互补型的。女性在那样的社会里,享有高度的自主权与决策权,两性关系平等而自由。后来由于出现了私有财产、商品生产、现金关系及西方价值观,单一的无阶级社会便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了阶级与性别不平等的阶级社会。因此,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结论:妇女受压迫是同国内外阶级压迫分不开的。现代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结合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而且是今日世界不平等与不公正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认为,认识到各阶级中不可调和的冲突是理解现代社会形式及变化方向的一把金钥匙。因此,妇女受压迫,根据她们的分析,只是一种附属现象,是压迫中的一种更为根本的

症状。她们明确地指出，妇女所受的压迫不是来自性别主义者，不是来自男人，而是来自资本主义制度。从这一点上说，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根本无法解放受压迫的妇女和男人。所以她们大声地宣布：只有把妇女引入社会主义生产当中，才是妇女解放的唯一出路。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资料将再一次重新分配——归属社会，归属全体妇女及男人。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在经济上对男人的依赖将被铲除，因此也就消除了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基础。换句话说，一旦妇女在经济上独立于男子，歧视妇女的种种残渣余孽将随之失去其迷惑性，并逐渐消失。70年代以来，一些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有必要进行一场中国人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以消除压迫妇女的种种旧的习惯势力。然而，进行这种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的革命真能从根本上解决其经济基础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吗？难道在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存在种种歧视妇女的现象了吗？对此，马克思主义者陷入了苦苦的探索之中。

综观历史，自从恩格斯以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有关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论著，并对保守主义“生理是两性差异的基础”的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这些学者对社会革命特别感兴趣，总是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对妇女问题，特别是对妇女受压迫问题的理解上。她们对西方女权主义者所从事的斗争及自由派对第三世界妇女所作出的努力不以为然，在她们看来，妇女受压迫是阶级压迫在起作用，阶级压迫取代了所有形式的压迫。事实证明，这种简单的分析论有其致命的缺陷：两性关系变成了生产关系。因此有的批评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性别盲”。然而，马克思主义妇女论对妇女运动的发展却有着极为特殊的贡献：它使对妇女受压迫这一研究课题的重点从个体上——自由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和保守主义理论家所研究的重点——转移

到产生这种压迫的结构上——国家、家庭和阶级。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妇女论还为另一个理论——社会主义女权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自由女权论 (LIBERAL FEMINISM)

自由女权论，又称自由女权主义理论，起源于西方 16、17 世纪的“社会契约理论”(The Social Contract Theories)。这种理论有别于过去的各种政治理论。它认为，任何形式上的等级制度或权威都需要有正当的理由。因此它坚持在男性具有合理权威性及在社会劳动和家庭劳动(或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泾渭分明的基础上，寻求自由与平等。早期的自由派理论家们基于一种人人都有争取合理生存权利的思想，要求人人平等。这种新的社会观念就是自由与平等。按照自由派的解释，“自由”不应受到任何干扰，尤其是来自政府方面的干扰。但自由派并不因此主张废除政府的权力，他们只是强调，政府的权力只有为人民所认可才算合法，况且政府权力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他们看来，政府只能管理所谓人类生活的公共领域，不能或无权干涉所谓的私人领域。这一论点始终是自由派理论的基础。事实上，从 16、17 世纪以来，公共领域同私人领域的楚河汉界一直是自由派政治理论的中心，并被现代自由女权主义者视为法宝。

从理论上讲，自由派没有随意要求废除政府，因此也就没有随意主张废除财富与权利上的不平等。换句话说，因为他们承认了“合法的”权利，所以也就有了“合法的”不平等。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平等”从相应的基础上开始，或在相应的基础上分配，那么则应看作是“合法的”不平等。尽管在确定什么是构成社会不平等相应基础的问题上，仍有许多争议，但自由派始终认为，一个人继承下来的某些特征，如家庭和种族，均与社会不平等无关。他们的观点是：一个人只要他(或她)的才智允许，就能自立于社会，而不应受

到法律或习惯势力的阻碍与限制。至于什么样的素质才能算作是才智以及这些才智怎样才会被发掘,完全取决于市场经济中才智的供求关系。因此,为了确保人尽其才,才适其用,社会必须提倡人人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与平等”已被自由派演绎为“机会均等”。

几乎是在自由与平等形成观念化的同时,妇女们便纷纷要求这些观念必须适应于她们。第一篇被认可的女权主义论文是玛丽·沃尔斯通科雷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维护妇女的权利》(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该文发表于1792年。沃尔斯通科雷夫特指出:仅性别不同不能成为否定妇女平等权利的充分理由。针对当时认为推理能力是权利归属的适当的基础,沃尔斯通科雷夫特辩论道,妇女的思维能力同男子的思维能力是一样的。她认为,所谓妇女才智低下是由于她们所受的低下教育及缺少平等机会造成的,并不是她们生来如此。

沃尔斯通科雷夫特的主题一直被自由女权主义者延续着,从19世纪的泰勒和米尔(Taylor & Mill)到今天的自由女权主义者们,其辩论的焦点始终是机会平等。19世纪的泰勒和米尔曾呼吁:妇女应享有同男子一样的法律权力。许多当代著名的女权主义者也基本上持相同的观点。

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同保守主义历来针锋相对。事实上,自由女权主义者并不是极力否定保守主义者的“生来即不平等”的结论,而是特别反对保守主义者得出该结论的推理过程。在自由女权主义者看来,两性之间不容争议的身体上的差别不应该是造成妇女所获机会相应减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她们认为,女性心理上的性别差别与社会及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女权主义者的这一观点彻底否定了保守主义者的推理:性别差别是天生的,是根本无法改变的。利用大量的事实,自由女权主义者们还论证道:目前妇女在就业和受教育上的不平等充分说明了两性之间心理上的差别

是由社会强加的,而不是由其生理上决定的。尽管米尔也承认,两性之间可能存在着某些天生的心理差别,但是现代自由女权主义者却坚持认为,直到男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人们才能确定两性之间心理上的差别到底是由哪一方面造成的一——社会?生理?即使将来证实,两性之间心理上的差别确实是由生理决定的,自由女权主义者依然会否定那种保守主义推论:两性之间的差别为男女之间的机会不平等提供了法律依据。对自由女权主义者来说,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就在于妇女缺少平等的公民权和平等的就业机会。然而她们却很少对此作出历史性的沉思:为什么这种不平等会存在?妇女所受的压迫能不能通过直接的反性别歧视来解决?为什么至今妇女仍在受歧视,甚至受压迫?

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中,自由女权主义开始成熟起来。20 世纪 60 年代的“行动主义”(注:主张为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有力行动)又适时地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于是,自由女权主义不断地发展壮大——“联合国妇女十年”(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for Women,联合国规定 1976~1985 为联合国妇女十年)的出现标志着自由女权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今天,自由女权主义不仅继续在法律改革和促使妇女参与政治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其改革思想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政治家、法律工作者和知识妇女们。1985 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第三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题为《向前看战略》(Forward-Looking Strategies,即《到 2000 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向前看战略》号召各国政府认清失业对妇女的影响;制定平等的就业和培训机会;改善主要及辅助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和结构;鼓励并调动女性小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建立并完善各种托幼保健设施;通过教育与大众传播,鼓励男女之间共同承担抚养孩子、操持家务的责任与义务。正是在这个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妇女参与发展的研究才得以广泛开展。

自由女权论以沃尔斯通科雷夫特的论著为起点，并依据米尔和泰勒的灵感为发展动力，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自由女权主义者们从社会契约的原则及个人权利理论出发始终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妇女也应具有“合理性”，即合理的权威性。尽管她们也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仍存在着社会不平等与不公正，但在她们看来，这种不平等与不公正只是社会的一种变形。换句话说，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从属地位不过是对人人平等和人人公正的社会规范的偏离。而这种偏离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及人们观念的转变而加以改变。由此看来，自由女权主义者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优越性坚信不移。这就是为什么自由女权主义者们坚信：如果妇女能同男人们一样从被禁锢的家庭中走出来，投身到社会劳动中，那么，性别歧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就能大大改观。这也就是为什么自由女权主义者们一再强调要实施一些法律手段——例如，增加选举权，制定有效的法规法案及广泛地开展宣传普及教育，鼓励第三世界妇女参与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当中去。

三、激进女权论(RADICAL FEMINISM)

自由女权主义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均有较长的哲学传统。而激进女权主义则相反，它是一个较新的政治理论，而且正在发展之中。正因为这样，就有了相当多各种各样被描绘成激进女权主义的观点。下面，我们将探讨一下这其中的种种不同。首先让我们鉴别一下那些我们认为是激进女权主义学说共同点的各种基本假设。

与其他女权主义理论不同，激进女权主义者一贯坚信：妇女受压迫是根本的。这种说法可以理解成以下几点，即：

1. 历史上，妇女是最先受压迫的一群人。
2. 妇女受压迫的范围最广，它存在于任何已知的社会中。
3. 妇女受压迫的程度最深，因此也最难根除。任何其他的社会变革，如废除阶级社会，均不能消除妇女受压迫的现象。

4. 妇女受压迫的现象使得受害者在质上和量上深受其苦,而且这种苦难常常不为人们所认识,因为在压迫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着性别偏见。
5. 妇女受压迫为人们理解其他形式的压迫提供了概念性的模式。

尽管不同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对妇女受压迫持有不同的观点,但至少都同意上述前3个观点。

苏雷米斯·范瑞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的《性别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发表于1970年,是早期激进女权主义者系统分析妇女受压迫原因的论著之一。在当时,范瑞斯通的分析格外引人注意,这是因为女权主义者通常否定的“妇女的从属性起源于生理”的观点在她的分析中又得到了新的“复苏”。与大多数当代女权主义者不同,范瑞斯通争辩道:妇女从属性的根源在于人类生理上的某些全球性的事实——长时间的婴儿哺乳期,这期间一方面婴儿依赖成人,尤其是母乳而生存;另一方面妇女产后体弱,加之养育孩子,使得她们不得不依赖男人而生存。范瑞斯通因此得出结论:妇女解放需要一种生理革命,“一系列的技术发展,不仅允许人工喂养婴儿,而且可以子宫外生育,这将从根本上消除妇女对男人身体上的依赖。”很显然在范瑞斯通看来,妇女对男性身体上的依赖是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基础。范瑞斯通的这番理论乍一听似乎具有保守主义论调,好像她在提倡生理决定论;但细一琢磨,范瑞斯通的结论却是极为激进而“新潮”的,因为她的理论是:技术可以征服生理。范瑞斯通在其书中详尽地论证了其激进女权主义的观点:以性别为基础的压迫为人们理解其他形式的压迫,如种族和阶级压迫,提供了概念性的模式。对于未来工作,如性行为、家庭、育儿等方面,她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尽管人们对范瑞斯通的书仍有许多看法和争议,但她的书仍不失为一本具有洞察力并能引起广泛兴趣的书。

夏洛特·本奇 (Charlotte Bunch) 关于妇女受压迫根源的论述没有采用范瑞斯通书中所提到的生理决定论。出人意料的是，本奇出于某种原因，对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未作任何解释。尽管如此，本奇确信：妇女的屈服性是第一种形式的压迫，也是程度最深的压迫，这是因为妇女首先受男性统治的压迫，其次才受种族和阶级的压迫。所以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反，本奇认为，妇女应该立即向男性统治展开斗争。为了做到这一点，她大声疾呼：妇女必须抛弃那种分离妇女、使妇女依附于压迫者的异性爱。

本奇使得范瑞斯通书中某些不明朗的观点变得明确了。这个极具激进女权主义特点的观点是：个人就是政治。在本奇看来，在所谓的私人领域里，妇女所受的压迫同她们在所谓的政治领域中所受的压迫一样多，甚至更多。她指出，把人类生活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实际上掩盖了妇女在私人领域中所受到的有计划的控制，并且使妇女在私人领域的斗争非法化。由于男性的控制影响了妇女生活的每个领域，因此，妇女必须在各个方面——包括家庭和性生活，同男性的控制作斗争。也正因为这样，本奇的观点是：女性间的同性恋关系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喜好，而且也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手段。

著名的法国女权主义者蒙妮科·威特歌 (Monique Wittig) 也有着独特的女权主义观点：“女性”心理是社会强加的。该观点远远超越了那些相对熟悉的女权主义观点。显然，威特歌有关女性社会决定论的观点同范瑞斯通的女性生理决定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威特歌认为：女性的身体是社会塑造的，女性是做出来的，而不是生出来的，即女性身上的一切都不是“自然”的。

一些激进女权主义者对一些她们认为是女人特性的东西大加赞颂。在这一点上，威特歌却反其道而行之。她认为，真正的妇女解放不仅要超越“男女机会平等”这一自由派理想，而且要超越一些激进女权主义者所提倡的“母权制”理想。在威特歌看来，真正的

妇女解放,首先要消除那种把男女分成不同对立面的现象。具体地说,在威特歌式的新社会中,将只有“人”,而没有“男人”和“女人”。

从激进女权主义的发展历史看,它的产生是对 20 世纪 60 年代各种激进政治运动中出现的性别歧视主义的一个有力的回击。严格地说,激进女权主义没有一个清楚而连贯的理论体系,它的基本思想完全反应在其产生的原动力上。也就是说,许多激进女权主义的概念和语言都是从其他一些政治理论中借鉴并折中而来的。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压迫理论也被“移植”到了激进女权主义的思想中,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妇女受压迫”的提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由激进女权论而产生的大混乱,首先妇女被一种新的理论解释为“被压迫阶级”。从表面上看,这种提法好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但严格地说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其次,激进女权主义者还以一种非历史的观点来看待“妇女受压迫”,其理论前提是:父权制是普遍存在的,它超过了所有其他形式的压迫。显然,这一前提掩盖了各种人类社会中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和历史环境的特殊性。另外,同保守主义一样,激进女权主义者也把两性关系归纳为依据生理而定的自然分类。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父权全球性”的观点对女权主义者仍有强大的号召力,并不断得到学术界的支待,因而它也就越来越多地妨碍了女权主义者对妇女(尤其是第三世界中妇女)受压迫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正是由于“父权全球性”观点,使得西方女权主义者们顶住了“种族优越”的谴责,在世界舞台上大肆鼓吹其女权思想。1980 年,当非洲妇女走出哥本哈根第二届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会场时,她们终于看清了西方女权主义者——那些大谈特谈“阴道作为野蛮父权光顾之所”的西方富裕的中产阶级妇女们——的真面目。

然而,我们不应也无法否认激进女权主义者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这是因为,激进女权主义的产生不仅是对西方世界中妇女经历的直接反映,而且也是西方反性别歧视行动和运动的一种具体体